

## 第五章 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現況 及對台灣的影響

前一章的要點指出，中國大陸的經濟形態包含顯著的政治性與計劃性，而高等職業教育的訴求目標顯然是職業導向，是屬於經濟的層面。所以大陸高等技職教育的發展自然與其經貿政策有極大的關聯性，基於此種關係便有必要討論近年來的經濟發展與現況，及其對台灣的影響。

### 第一節 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現況

中國大陸經濟起飛的主要原因乃在於，自 1978 年底開始採行的對外開放經貿政策，這種開放政策改變以往封閉的堅持。中共自 1949 年建國至 1978 年底為止，在這段期間中掌政的中國共產黨，堅持對外經貿策略採取封閉的政策。當時政治上主要的影響力是以毛澤東為主，因為他奉行馬克斯的思想，承襲史大林的模式，並以極左的意識形態來修正與發展，所以深富革命的意識形態（洪能平，民 83）。在當時集權的政治體制下，中國大陸逐漸走向搞個人英雄主義的情境。在這股毛澤東勢力的影響下，顯然當時的政治意識形態視西方國家的自由經濟，是資本家與資本主義的溫床，所以極力要防堵西方的經濟體制進入中國大陸。又如前面所論述的此種西方的經濟體制，乃是在自然情境下人類所建構的結果。基於此種緣故，中共要防止在當時仍是農業社會的中國大陸，走向工業化的資本社會，只有靠政治與武力的途徑，將自己的國家圍堵成一個封閉的國度，使之不與外在的西方自由國家產生真正的經貿交流。這種固步自封的對外經貿措施顯露在

毛澤東主張的中國發展路線：

「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洪能平，民 83：頁 32)

上述引文顯示出這種作法的目的在於，防止中國大陸走向西方資本社會的形態，而其手段往往是以政治的指令來隔離外國資本社會的經濟勢力。換句話說，在經濟上缺乏與外國的交流，中國大陸將處於某種封閉與孤立的狀態。另外，顯然掌政初期的中國共產黨，或是握有勢力的毛澤東等人，對於經濟的範疇仍處於摸索與學習的階段。國內研究者趙雲翼（民 85）便指出，執政初期的中國共產黨缺乏大型經濟體制的經驗，也沒有發展出適合自己國情的一套經濟政策。例如在 1957 年前所憑藉的只是，過去在革命時期所獲得小區域性的經濟工作經驗，而非全國性大型經濟體制的經驗。1957 年之後也非自我發展出的政策，而是採行蘇聯路線，高度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是此種路線的特色。在 1958 年採行的「平均主義」，其作法是典型的共產，共產意指工具、生活型態、產品分配的一致性，所以生產工具歸公、自留地取消、農民集體工作與生活、一起食用大鍋飯、無論勞動多寡分配上皆是同酬。

在這種不當的經貿政策下，再加上缺乏管理全國性大型經濟體制的經驗，使得中國大陸的經濟成果乏善可陳。最嚴重的是政治意識形態的舉動，更加深經濟的惡化。在這方面最明顯的例子是「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毛澤東將原本理論觀點的：「階級鬥爭不但是推動歷史發展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唯一動力，而且也是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唯一動力」，付諸行動，所以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發生。這些不當措施

與舉動所累積的負面影響是顯然的，且深遠的：

「根據統計，1958到1962年，農業淨產值平均每年下降5.9%，輕工業下降2%，重工業只增長3%，職工每人平均實際工資下降20%，財政連續三年出現赤字，大陸人民活活被餓死的高達2,000萬人。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後果更為嚴重。從1974年到1976年，全大陸大約損失工業總產值1,000億元，鋼產量2,800萬噸，財政收入400億。1976年全國工業企業的資金利潤只及1965年的一半，虧損企業達1/3以上，虧損金額73億元。職工的平均實際工資10年間不僅沒有提高，反而下降6%，農民從集體得到的收入也增加很少。」(趙雲翼，民85：39-40)

由上可見，在這種封閉經貿政策與不當政治行動下，導致當時中國共產黨表現出遠低於一般水準的經貿政績。在全國工業生產總值巨幅衰退的情境下，無論工人與農民的所得不是無明顯增加，便是下降。在這種情況下，人民生活水平根本無法提升，甚至每下愈況。

這種反自由經濟體制作法所導致的惡果，其實是很容易理解的。從較簡單的原理來說，在工業化國家的人民之所以擁有極高的生活水平，如較好的物質生活條件，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工業化社會中機械的大量生產。而大量的產品更需有銷售的市場，這種市場的含義往往是擴張至海外。國內的消費能力往往只能滿足某種程度的銷售市場。換句話說，更大量的機械化生產需求更大的市場，這便需海外的龐大市場，大量的生產便提供為數眾多的就業機會，在這種情形勞動者自然獲得比農業更高的收入。再者，工業化的持續更能改變既有的生產技術，工業的深化將需求更有技術與訓練的工人，此種情形亦會進一步提高勞動者的所得。社會學家 Dahrendorf (1959) 在其工業化社會的

觀念中，主張生產技術的深化，會改變既有的勞動力結構。在這種工業化的社會中，無技術的工人在總勞力中只是少數。相反的，此種社會需求大量有訓練、有技術的工人。再者，公司的營運與管理亦起變革，由於委託制度的產生逐漸需求為數眾多的經理人員。總結這些改變，勞動力是從無技術性走向有訓練、有技術，甚至是專業性的取向，所以其報酬亦會隨之提升。另外從整體局面而言，工業化的成功能提供政府更豐富的稅收，在這種情境下政府更有能力來改善社會的整體設施，這方面亦也有助整體生活水平的提升。

然而，開放政策前的中國大陸卻反其道而行，這種封閉政策致使其生產銷售市場，絕大部份情形侷限於自己的國內。再加上不重視民生工業的發展，與缺少資本投入的生產與研發，致使開放前中國大陸的生活水平是乏善可陳。無論個別層面的勞動力個人收入，或是全國性的整體社會建設，都遠低於西方自由社會的水平。顯然，這種每下愈況的局面提供某種修正意識形態的機會，鄧小平的政治勢力便在此種情境再度竄起。在對外的經貿政策上，他主張以大膽開放的修政路線進行：

「以資本主義的經濟管理方法，來啟動和潤滑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機制，以搞活社會主義，深具改革意識形態的內涵。因此，鄧小平所要建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可說是要建立具有資本主義色彩的社會主義。」（洪能平，民 83：32）

由上述引文可見鄧小平不將西方的資本視為毒蛇猛獸，反而欲借助其力來改善中國大陸境內蕭條的經濟情況。然而，這種對外經貿開放的政策，及引進外資的作法，在政治意識形態上產生某種程度的根本性衝突。因為，將與中國共產黨所堅持的非資本主義的社會相抵

觸。鄧小平的化解之道乃將經濟與政治分離，並調以文化獨特性的論調。所以他強調「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資本化的社會主義仍是共產黨專政，所以在基本上並未悖離中國共產黨所定義的無產階級專政，並符合中國的特有國情。經貿的開放政策於是得到政治勢力的支持，只要在堅持社會主義的前提下，皆可放手一搏。在「對內搞活，對外開放」兩大指導原則下，無論農村與城市的經濟體制皆進行根本性的變革，例如公營事業自負盈虧、開放沿海城市、建立經濟特區等便是其具體措施。

表三 中國大陸 1979 年起的實質國民生產總值 (Real GDP)

單位：百萬美元

年度	名目 GDP (1)	實質 GDP (2)	實質 GDP 成長率 (3)
1979	3998.1	3919.7	
1980	4470.0	4217.0	7.58%
1981	4775.1	4663.2	10.58%
1982	5182.3	5085.7	9.06%
1983	5787.0	5701.5	12.11%
1984	6928.2	6739.5	18.21%
1985	8527.4	7837.7	16.29%
1986	9687.6	9139.2	16.61%
1987	11307.1	10537.8	15.30%
1988	14074.2	11877.0	12.71%
1989	15997.6	13580.3	14.34%
1990	17681.3	17317.6	27.52%
1991	20188.3	19619.3	13.29%
1992	24362.9	23114.7	17.81%
1993	31380.3	27721.1	19.93%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 1994。轉引自胡志強 (民 84：頁 3)。

這種開放政策顯然有著極成功的效應。其主要原因乃在於中國大陸擁有超過十億的人口，這種為數龐大的人口代表全球數一數二最大的潛在消費地區，當然還有其本身廣大的領土與豐富的資源，這些強大的誘因便吸引了可觀的外資。在 1993 年中國大陸所吸引的外資金額，在世界上排名第二，僅次於美國。至 1994 年底為止，總共有

221,718 個外資項目在中國大陸進行投資，這些外資與中國大陸政府的協議金額，更高達 3,033 億 5800 萬美元，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則高達 956 億 5700 萬美元。這種經貿開放政策不但很成功的吸引自由經濟體系的資金，亦極成功的促進國內的經濟活動。從官方的統計資料中顯示，此種經濟改革與門戶開放政策直接促進中國大陸的高度經濟成長。表三的資料顯示出自 1979 年起，中國大陸的國民生產總值 (GDP) 在金額上有極大的提升，從經貿開放政策的實施至 1993 年止，中國大陸的國民生產總值從 1979 年的 3939.7 百萬美元激增到 1993 年 27721.1 百萬美元，在這段十四年間金額總數的成長超過 7 倍之多。1981 與 1983 年之後每年的 GDP 皆呈現二位數字的高度成長，在 1990 年更高達 27.52% 的成長率。

## 第二節 中國大陸與台灣間的經貿與投資活動

顯然，已間隔數十年未有實質交流的臺海兩岸間關係，亦受到這種對外經濟開放政策的影響。雖然我方在政策上尚未有明顯的改變，但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台灣經濟體，一向注重靈活彈性的策略，仍透過各種的途徑與中國大陸，進行少量與間接的經貿活動。如根據統計，在 1980 年，台灣廠商便對中國大陸輸出約兩億三千四百九十七萬美元的貨品 (簡宏志，民 83)。在不同來源的資料亦證實此種事實，從表四中的資料，我們可清楚地看出在 1981 年，政府對中國大陸經貿往來解禁前，台灣的企業便已對彼岸間接輸出貨品。當年臺海兩岸間間接貿易總額的估計值，更高達四億六千萬美元。之後的 1982 與 1983 年這兩年間，兩岸轉口貿易金額轉趨減少，這種衰退的主因在於是受到兩岸經貿政策的影響 (夏樂生，民 85)。特別是中國大陸

在景氣過熱時採取經濟緊縮政策，進而造成兩岸貿易活動的萎縮。

表四 兩岸實際貿易金額估算表

單位：百萬美元

年別	台灣經香港轉口輸往大陸 (1)	台灣對香港出口 (2)	香港自台灣進口 (3)	臺港統計差異 4 = (2) - (3)	台灣對大陸出口估計 5 = (1) + (4)	台灣自大陸進口估計 (6)	臺海兩岸貿易總額估計 7 = (5) + (6)
1981	384.2	1897.0	1896.4	0.6	384.8	75.2	460.0
1982	194.5	1565.3	1570.1	-4.8	*194.5	84.0	278.5
1983	157.8	1643.4	1600.0	43.6	201.4	89.9	291.3
1984	425.5	2087.1	2217.5	-130.4	*425.5	127.8	553.3
1985	986.8	2539.7	2682.4	-142.7	*986.9	115.9	1102.7
1986	811.3	2921.3	3072.8	-151.5	*811.3	144.2	955.5
1987	1226.5	4123.3	4275.1	-151.8	*1226.5	288.9	1515.4
1988	2242.2	5587.1	5682.4	-95.3	*2242.2	478.7	2720.9
1989	2896.5	7042.3	6606.9	435.4	3331.9	586.9	3918.8
1990	3278.3	8556.2	7439.9	1116.3	4394.6	765.4	5160.0
1991	4667.2	12431.3	9605.0	2826.3	7493.5	1125.9	8619.4
1992	6287.9	15416.0	11156.3	4259.7	10547.6	1119.0	11666.6
1993	7585.4	18454.9	12047.2	6407.7	13993.1	1103.6	15096.7
1994	8517.2	21263.0	13757.7	7505.3	16022.5	1858.7	17881.2
1995	9882.8	26123.6	16572.6	9555.1	19433.8	3091.4	22525.2

資料來源：兩岸經濟統計月報(民85年3月)。

轉引自夏樂生(民85：頁65)。

註：\*4為負數時不計入(4)而逕以(1)為(5)。

這種海峽兩岸間的經貿往來關係，後來逐漸發展成大量、全面與資本密集的現象。其中主要原因在於受到台灣政策面改變的激勵。如在1984年受到我國政府逐漸放寬，對大陸地區進行間接貿易的限制，使得海峽兩岸間的轉口貿易逐漸轉為熱絡。該年兩岸間的間接貿易估計總額，達五億五千三百萬三十萬美元，比起前一年(1983年)的二億九千一百三十萬美元，成長將近兩倍(189.94%)。在1987年，政府所宣佈的開放國人赴大陸探親的政策，更使兩岸間的貿易活動更為頻繁與密切。該年海峽兩岸間的間接貿易估計總額，激增至十五億一千五百四十萬美元，這個金額比起1986年的九億五千五百五十萬

美元，也成長超過一倍半(158.60%)。為因應兩岸間日益頻繁的文化、經貿活動，我國政府更於1988年8月成立，臨時任務編組的行政院大陸工作會報，以協調各主管機關，逐步的建立經濟與貿易的交流秩序。之後的措施更消滅臺海兩岸間的貨物間接往來，與臺資及技術登陸中國大陸的限制。例如，1989年6月，開放大陸地區物品間接輸入台灣地區。1990年8月，開放台灣地區廠商對大陸地區間接輸入貨品。這些一連串措施的影響力，便顯現在隔年兩岸的間接貿易總額，從三十九億一千八百八十萬美元，躍升至五十一億六千萬美元。在1991年的貿易總值高達八十六億一千九百四十萬美元，1992年的臺海兩岸間接貿易估計總值，更從十位數跳升至十一位數的貿易值。

伴隨這種海峽兩岸間貿易愈趨緊密的情形，更導致台灣廠商以直接或是間接的方式，在中國大陸設廠生產，以利於更快、更直接掌握當地的市場需求。這種臺資登陸中國大陸的情形，與前述海峽兩岸間經貿往來的情形極為相似，都是台灣的商業行動走在政府改變政策之前，當然這也顯示出經濟活動與政策互相影響的特性。雖然，在1990年10月政府宣佈，國內廠商可經核準赴大陸地區，從事間接投資或技術合作之前，缺乏關於臺商投資中國大陸金額的官方資料。但是，彼岸的官方統計資料顯示，在1991年之前臺資早已登陸中國大陸，如在1990年投資的件數更高達1,117件，協議金額也高達九億八千四百萬美金。政策解禁後臺商在大陸的投資活動更為積極，如在隔年大陸當局統計的投資總額，竄升至三十四億五千萬美元，比前一年的金額成長了約三倍半(350.61%)。

上述各要點顯示，無論在經貿往來或是資金與技術投入，台灣與中國大陸已愈趨緊密。當然，這種經貿往來的頻繁也反應出，海峽兩岸的政治局面已不再是冰凍與僵局的情勢，就如前述政府在法令的修



正，反應出兩岸對立的局面已成歷史名辭了。儘管如此，海峽兩岸間仍存有某種程度的政治疑慮，所以台灣對中國大陸的經貿政策，總是呈現保守的特性，這種特徵便一直出現在「間接貿易」的堅持上。

表五 台商對大陸地區間接投資金額統計

單位：百萬美元

年別	經濟部核準資料			大陸對外公佈資料			
	件數	金額	平均每件金額	件數	協議金額	平均每件金額	平均實際金額
1987				80	100	1.25	
1988				435	519	1.19	
1989				552	437	0.79	
1990				1117	984	0.88	
1991	237	174.16	0.73	3800	3450	0.91	872
1992	264	246.99	0.94	6430	5540	0.86	1053
1993	9329	3168.41	0.34	10948	9970	0.91	3139
1994	934	962.21	1.03	6247	5397	0.86	3391
1995	490	1092.71	2.23	*3052	*2783	*0.91	*2250
累計	11254	5644.49	0.50	*30492	*27140	*0.89	*10810

資料來源：轉引自夏樂生 (民 85 : 65-6)。

註：\*表示大陸對外公部資料為截至 1995 年 9 月底止。

### 第三節 中國大陸與台灣間的文化交流活動

顯然，臺海兩岸仍存在某種程度政治意識形態的對立狀態，但是隨著海峽兩岸間經貿往來的日益頻繁，再加上政策與法令的解禁，彼此間的政治氣氛已有逐漸解凍的現象。這種新的局面往往能促進台灣與中國大陸間的文化交流。特別是文化交流較不具政治色彩，卻能成為政治交流的基礎。因為透過文化的交流，彼此可認識對方，因而可減輕海峽兩岸間，已阻隔近五十年所產生的疑慮。這種互相的認識也能產生某種程度與某種形式的信賴，以作為日後政治談判與交流的起點。再者，文化交流亦比經貿往來更易進行且較無顧忌，其中原因在

於經濟實力是一個國家的具體國力表徵之一。而且，在兩岸談判過程中，政府手中所握有較有力的酬碼，乃在於資金、經濟與技術。由於這兩方面的因素，使政府會顧及資金、技術與產業全面登陸中國大陸後，造成在政治談判過程的不利情勢。

在這些方面的考慮下，文化交流成了海峽兩岸對立近五十年來，作為良性互動的敲門磚。換句話說，在此種特殊的情境下，文化交流同時得到臺海兩岸政府的首肯與支持，所以彼此間的文化交流變得日趨頻繁與密集。關於這方面的交流情形僅就教育方面加以探討，其原因有二。顯然，文化交流的項目包羅萬項，限於文章的篇幅無法一一陳述與分析，所以必須有選擇性。再者，教育方面是屬於較具體且長久的項目，而且它又與本專案主題有直接的相關。

在上述特有的情境下，的教育界的確也感染了大陸門戶開放後引發的大陸熱，兩岸間有相當多的教育交流活動。然而，事實上關於兩岸間的教育交流活動，僅有學術方面比較富有「互相交流」的特性。如兩岸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的互訪，或是臺海兩岸間共同進行的學術研究計劃。但在許多其他方面並未有真正的交流。相反的，是只呈現單向活動的特性，其中部份的原因是由於政策的保守取向使然；當然這是過渡時期的不得已的權宜作法。根據國內研究者林谷蓉（民84）所列舉的資料顯示，發生於民國七十七年間，臺海兩岸間的求學與進修活動，都是單向活動。如國內一家樂器公司在民國七十七年七月中旬，組成一支包括在學生的「民族音樂短期進修班」，首次赴廣東深圳市進修，並於隔月學成返臺。在同年八月，在本省鑲牙界某著名醫師的穿針引線，福建醫學院專門為台灣開闢「牙醫專科班」。此專科班招生的對象是在台灣的齒模製造技術員、鑲牙生，或是從事口腔醫學臨床工作五年以上者。

這種在中國大陸修讀學術課程的情形，在隔年有擴大與白熱化的趨勢。例如林谷蓉所引用隔年發生的八件交流事件中，僅有一件是大陸學生欲申請就讀台灣地區的大學，其餘都是記載台灣學生感染大陸熱的情形。如在民國七十八年元月，有五名台灣學生透過京港學術交流中心，向中國大陸的大學申請就讀研究所，其中四人想學中醫。同年八月，在廈門大學海外函授學院所開辦的第一期「中醫大專畢業證書班」，共有十九位學員全部來自台灣。在九月時，有來自台灣的十一名學生在福建中醫學院完成報到手續，並將在此所學院學習五年，以取得中醫醫學士的資格。同年十二月的報載更陳述，中國大陸的北京、清華、上海復旦等大學將聯合擴大海外招生。其中對吸引台灣學生報考其研究所更提供優厚的條件，如免學費、住宿費，並享有公費醫療，每月並發給每人約人民幣一百元。表六所陳列的學校即是參與此種聯合招攬海外學生的高等學校，從表中的資料我們可發現，在參與的六十一所大學校、院中，以華北地區的二十三所為主（約37.7%）。表中資料也顯示，參與此項聯合對臺招生的學校可說含蓋絕大部份中國大陸的地區，包含華北、華中、華南、西南、東北地區。其中含義代表大陸官方全面開放，並鼓勵台灣學生至中國大陸求學，這種與台灣政府的保守方式，顯然形成強烈的對比，當然其中多少含有政治上的企圖。姑且不論這種政治意圖的影響性，單就這種吸引台灣學生赴大陸求學的作法，在不久的將來將會有深遠的影響，特別是赴大陸就學的人數會日趨增多。關於這方面雖然缺乏全面具體的統計資料，但是某些事件所顯示的現象仍可作為推論的佐證。六四天安門事件的隔年，即民國79年欲就讀中國大陸大學的台灣學生數急速上升，其人數竟打破以往的港澳學生為主的現象，並且在海外報考總人數中高達百分之七十（林谷蓉，民84）。這種赴大陸求學熱未來恐怕

會更為加劇，原因之一是受到臺商在大陸經貿與投資深化的影響，這類活動的深化將需求更多的技術與經理人員，而曾在中國大陸受過教育訓練的人力往往更能受到青睞，因為這些人更能掌握大陸的風俗民情與經濟動態。這種就業優勢多少也產生某種程度的鼓舞作用。

表六 大陸開辦對臺招收碩士博士之高等學院

華北地區	華中地區	華南地區
北京大學	復旦大學	廈門大學
清華大學	上海交通大學	中山大學
中國人民大學	同濟大學	中山醫科大學
北京師範大學	華東師範大學	華南農業大學
西安交通大學	南京大學	暨南大學
北京農業大學	浙江大學	華南理工大學
協和醫科大學	湖南大學	東南大學
蘭州大學	武漢大學	華橋大學
南開大學	江蘇工學院	西南地區
天津大學	中南工業大學	西南師範大學
山東大學	華東工學院	四川大學
中央戲劇大學	南京航空學院	成都科技大學
北方交通大學	合肥工業大學	東北地區
北京醫科大學	武漢測繪科技大學	東北工業學院
中央美術醫學院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	吉林工業大學
青島海洋大學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哈爾濱工業大學
華北電力學院	武漢工業大學	哈爾濱船舶工程學院
北京中醫學院	華中理工大學	東北財經大學
北京體育學院	中國地質大學	
北京郵電學院	上海音樂學院	
北京外國語學院	中國紡織大學	
北京農業工程大學	浙江醫科大學	
西北農業大學		

資料來源：聯合報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第四版。  
轉引自林谷蓉（民84：116）。

形成這種台灣學生赴大陸求學有日趨白熱化的另一項原因，乃起於在台灣地區許多欲就讀碩、博士的大學畢業生，面臨激烈的升學

競爭壓力。這種現象的產生就如林谷蓉(民84)所言：

「當民生主義在台灣獲得重大成就，而實現教育機會均等與教育普及之後，卻出現生學主義與升學歷力，如文憑掛帥、明星學校、小留學生及中醫執照等問題。因解嚴後展開的民主、自由、多元社會，一方面造成脫序現象，另一方面，教育自由化呼聲頗高，自民國八十年起，大專錄取率提高為百分之四十以上，但研究所錄取率卻下降(平均錄取率碩士班為百分之十三，博士班為百分之四十六)致學位仍呈現僧多粥少情況，所以赴大陸獲取學位不失為一捷徑了。」(頁173)

從引文中可知，中國大陸的大學提供欲求取更高學歷文憑的台灣學生另一種的選擇，這個途徑似乎聞不到在台灣報考碩士、博士所呈現的競爭火藥味。顯然，在未來這種學歷取得的捷徑仍會持續，最起碼在某些科目如中醫，會吸引更多臺籍人士前往中國大陸取經。而這股大陸求學在白熱化在短期內並不易消滅，相反的更可能加劇。隨著赴大陸求學人數的增多，很容易產生像學歷認證的問題，實有賴在政策與法源上採取預先的作法，以免產生流弊或是損及人民的權益。

這種問題的嚴重性亦出現在臺資赴中國大陸辦學所衍發的問題上。這股赴彼岸求學以更快獲得學歷與證書的熱潮，不但未衰退，更延燒到學校的興辦，有許多臺籍人士正在中國大陸大興土木以興辦學校，甚至有臺資學校已開辦好幾年了。中國時報(民86)便披露一些臺資學校。例如台北市的私立育達商職王校長，在大陸河南鄭州創辦昇達大學。台北縣私立醒吾商專顧校長，在大陸江蘇鹽程創辦明達大學。其胞兄顧懷祖自1991年以來，在其家鄉附近捐資興建八所的幼稚園、小學與中學。台北市強恕中學紐校長，在江蘇南通市創設景范

專科學校，並在大陸上海已創辦上海強恕小學與強恕中學，他更進一步推動在馬橋興建強恕大學，其預定計劃將在明年的四月動工。這種愈演愈烈的情形就如該報所評論的：

「開放探親十年來，已有不少台灣人士在大陸捐資興學，但大多數只是出錢而已。近年來，台灣教育界在大陸捐資辦學日增，從大都會上海到內地河南，甚至內蒙古，從小學、中學到專科和大學，隨著嶄新的學校一個個的成立，台灣辦學經驗也逐漸擴展到大陸」。

儘管政府仍未開放臺籍人士到海峽彼岸投資興學，但是何以到中國大陸創辦學校呈現前撲後繼的現象？其中主要原因乃在於在中國大陸的確有此市場。就如前面各段落所述，受到門戶開放政策的影響，近年來中國大陸無論對外，或是國內的經濟活動皆呈現一片榮景。前文表三中的資料便顯示出此種現象，代表經濟活動力的國民生產總值自 1983 年起便以二位數字成長。表五的資料亦顯示出，臺商在中國大陸的投資金額以跳躍式的成長，這種現象也指向中國大陸強盛的經濟活動力。顯然，這種經貿欣欣向榮的情景，便意指需求更多有素質的人力。這種情境自然提供私人興學的空間，儘管這種辦學的舉動包含極高的商業氣息，但是由於是由臺籍人士所創辦，未來恐加劇前述學歷認證的問題，基於這些考量台灣政府實須預先防範未然，其中心主題便是學歷認證的問題。

#### 第四節 小結

由於中國大陸當局奉行的馬克斯的政治思想，其政治形態呈現異於一般自由國家的特性。就如之前段落所述馬克斯主義包含「反社會自然演化法則」與「反社會階級權力法則」。前者意指要推翻在自然狀態下，自由經濟活動與體制所促進人類社會進化的法則，這種反對的根源又聯貫到反社會階級權力法則。馬克斯強調自由經濟機制所形成明顯的社會階級藩籬，而且在馬克斯的眼中存於資本家與勞動者間的關係，並非功能的取向，而是衝突、宰制與控制。由於資本家握有生產工具所以得以剝削勞動者，這種過程所累積的生產利益，更有助於資本家維持其經濟的優勢，甚至擴張至政治領域。經濟與政治結合的結果使得勞動者永遠受制於資本家。換句話說，生產工具的擁有形成顯明的社會階級藩籬，資本家成為擁有特權的社會階級，權力的形成與擁有造成人類社會的不平等關係。這種推論使馬克斯堅持要達到社會階級的平等，必須藉助政治途徑來壓平社會階級，並且以計劃性的控制手段，才能使社會脫離在自然法則下形成的自由經濟體制，並消除存於其中的權力不平等。由於中國共產黨奉行馬克斯的思想，所以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呈現顯明的政治意識形態，此種意識形態更成為每一種政策與決策的指導總架構。

儘管中國大陸力行這種計劃性與控制性在社會運作的落實，然而此種反自然法則卻造成中國大陸經濟日益的衰退。這種局面進一步影響到政治勢力的消長，毛澤東勢力在此種局面漸為標榜改革派的鄧小平勢力所取代。然而，這種改革口號是以政治與經濟分離為出發點，在對外的經貿政策採取熱情擁抱西方資本家的策略，但是在政治上仍就死守馬克斯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依舊堅持社會的運作與發展不得斷傷共產黨的基本意識形態。由上可見，存於政經這兩種做法有顯明的衝突性與矛盾性，然而發展「具有中國特性的社會主義」口號

的提出，潤滑出了介於這種政治專政與經濟開放的矛盾。自 1979 年起，中國大陸的經濟便在這種門戶開放政策下起死回生，之後經濟的成長並以二位數字跳升。

當中國大陸呈現一片經濟榮景之時，人民逐漸感染大陸熱。儘管法令的限制，臺商仍經由各種途徑與中國大陸發展間接的經貿關係。逐漸成長的貿易量與金額更塑造成另一種新的政治氣氛，中國大陸市場變成臺商在國際市場與他人競爭與成長的另一契機，這種觀點所形成的壓力迫使政府，不得不逐漸解除許多以往政策與法令的限制。隨著臺海兩岸對立政治情勢的逐漸解凍，雖然是間接方式，但兩邊的經貿關係愈形緊密，龐大的雙方貿易額的締造，已無法割捨開這種共生的經濟體。政治情勢的改觀與經貿的密切往來，造就另一種的大陸熱，最顯明的例證是赴中國大陸求取學位與證書的台灣學生，有日趨白熱化的趨勢。彼岸政策面的開放與鼓勵，加上在台灣升學的激烈競爭壓力，與臺商在彼岸深耕的影響，促使這種赴大陸求學的熱潮不易消退。教育界感染的大陸熱亦出現在創校興學，政府明令禁止似乎仍無法阻止這種熱潮的發生，可觀的台灣資金已在或是正在中國大陸，進行另一種形式的投資 -- 創辦學校。不管是赴中國大陸求學位，或是在彼岸創校興學，已成時代的潮流並吞沒政府的公權力。在未來政府將面對伴隨而來的叢生問題，特別是對岸學歷認證的問題，這個課題實須從政策面著手，才能得到根本性的解決。

顯然，為保障求學者權益，又要確保其素質，學歷認證的問題須進一步加以規範化。然而，政策與法令的規範化，必須對彼岸的高等職業技術教育有通盤與周全的認識，如此才能有合理與周延的應對措施。要能對彼岸高等技職教育完整的了解，資料的收集最少須涉及 (1) 政策、學制；(2) 教育目標、入學資格及修業年限；(3) 課程規劃、



設計權責及主要內容；(4) 畢業證書授予單位及選定過程；(5) 畢業證書授予規定；(6) 畢業證書之規定與樣張與法定效力；(7) 對台灣學生就學之政策、規定及相關優惠措施等方面。第 1、2 項是每一個國家教育實施的基本依據，這方面往往顯現出其獨特的國情，亦即每一個國家往往訂立特有的教育政策、學制、目標，所以便有必要了解彼岸在這些類別的情形。而入學資格與修業年限的探討主要是顧及臺海兩岸不同的教育體制，是否可使學生作橫向與縱向的銜接。而第 3 項無論課程規劃、設計與內容，受到大層面政治的束縛 (Bernstein, 1996)。並且在前面文中已論述到，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呈現顯明的意識形態，而且要藉由政治的途徑以控制社會的運作，所以教育無法擺脫計劃性的控制。基於這種因素，中國大陸高等技職教育的內容極可能是不同的。特別以往國內學者的研究發現 (林谷蓉，民 84；歐用生等，民 81)，指出中共小學語文教育富有強烈的政治思想目標，馬克斯、列寧與毛澤東的思想即佔此科目課本內容的百分之四十一，其中更有明顯敵我內容，如在十二冊課本中對我國有敵意的內容高達三十三課。這種顯明的政治干涉極可能也出現在高等技職教育的課程內容上，所以須對其課程規劃、設計與內容有所了解。探討學生所學習的課程內容之後，便須分析第 4、5、6 項。因為這些方面代表對學生完成學業品質的把關，以及頒發畢業證書單位的合法地位，及其所產生的法力效力，所以對授予單位、畢業證書授予規定及畢業證書之樣張與法定效力等亦須加以探討。最後一項「對台灣學生就學之政策、規定及相關優惠措施」的探討，主要是針對臺籍學生赴大陸求學有日益增多的趨勢，而且這方面的研究可作為日後在教育上作為兩岸平等互惠原則的依據。